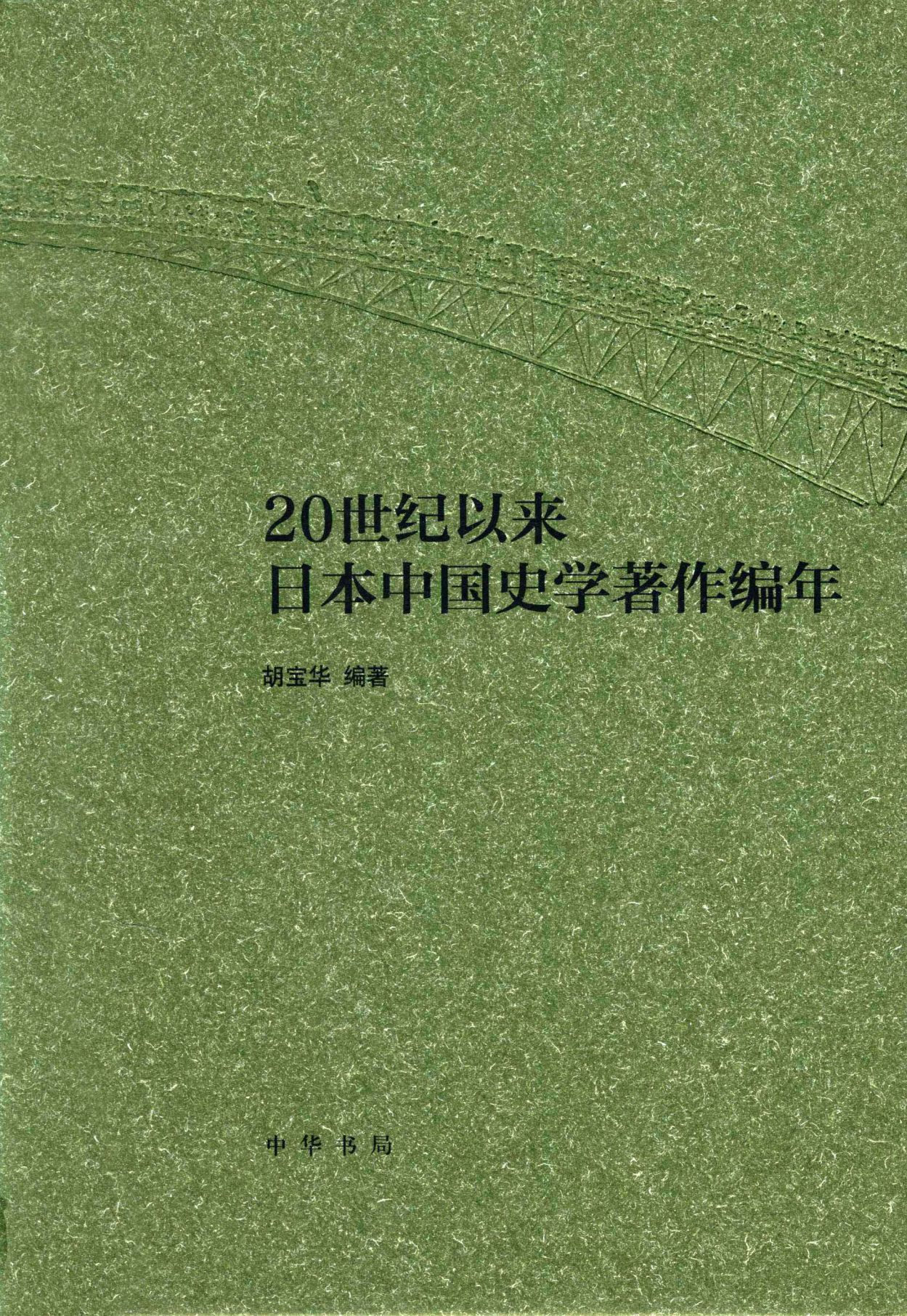




20世纪以来 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

胡宝华 编著

中华书局

20世纪以来 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

胡宝华 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 / 胡宝华编
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2.6

ISBN 978 - 7 - 101- 07947 - 0

I. 2… II. 胡… III. 中国历史:古代史 — 历史著作
— 专题目录 — 日本 IV. Z88: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065252 号

书 名 20 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

编 著 者 胡宝华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3 插页 4 字数 78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7947 - 0

定 价 98.00 元



中国学会合影纪念（大正九年，1920）

前排左起：羽田亨、内藤虎次郎、桑原隲藏、高濑武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

中排左起：那波利贞、横地得三、内藤隼辅、藤田元春、羽田正义。

后排左起：崎山宗秀、高畑彦次郎、冈崎文夫（右三）、神田喜一郎（右一）。



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纪念（大政十二年，1923）

前排左起：箭内互、斋藤清太郎、村川坚固、三上参次、坪井九马三、市村瓚次郎、黑板胜美、辻善之助、池内宏。

中排左起：鸟羽正雄（左二）、平泉澄（左四）、森谷秀亮、王桐龄、出井源亨、相田二郎（右三）。

后排左起：岩生成一（左二）、吉村茂树（左五）、甘庶普济、和田军一、川副博、丸山二郎。



Joseph Hackin博士东洋文库讲演合影(昭和八年, 1933)

前排右起: 和田清、津田左右吉、白鸟库吉、Joseph Hackin、岩井大慧(左一)。

后排右起: 加藤繁、石田幹之助、原田淑人。



东方学会京都分会合影(昭和二十八年, 1953)

前排左起: 羽田亨、英利世夫、梅原末治、贝塚茂树、水野清一。

后排左起: 吉川幸次郎、官崎市定、山本达郎、神田喜一郎、山口益。



伯希和等访问内藤湖南故居恭仁山庄 (昭和十年, 1935)
左起: 羽田亨、伯希和、内藤乾吉、宫崎市定。



加富洛夫 (B.G.Gafurov) 博士 (左) 与榎一雄 (右)。



忆小川琢治座谈会

右起：宫崎市定、小川环树、贝塚茂树、日比野丈夫。

左起：小牧实繁、榎山次郎、吉川幸次郎、森鹿三。



忆吉川幸次郎座谈会

右起：入矢义高、平冈武夫、贝塚茂树、小川环树。

左起：石田一郎、清水茂、吉川忠夫、笈久美子。



忆藤田丰八博士座谈会

左起：佐中壮、曾我部静雄、榎一雄、植村清二、福井康顺、前嶋信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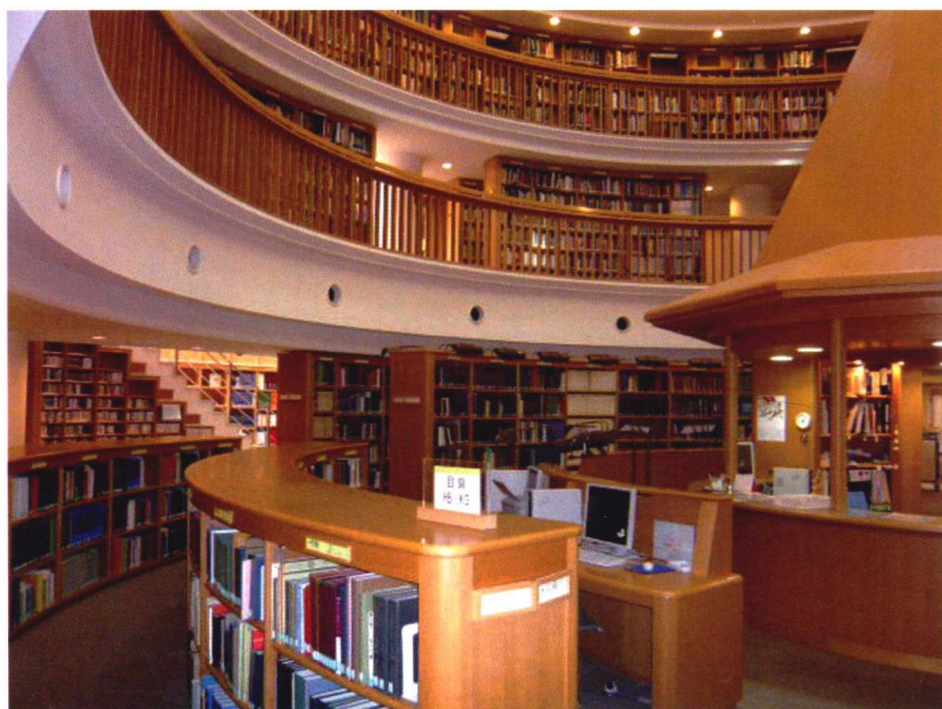
忆水野清一博士座谈会

前排左起：小野胜年、江上波夫、长广敏雄。

后排左起：林巳奈夫、水野松子、樋口隆康、日比野丈夫。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京都）

序 言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自7世纪遣隋使、遣唐使以来,到19世纪末,中国一直作为日本的憧憬和楷模。当时东亚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如今,这个文化圈只有中国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已经不再使用汉字。日本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12月12日在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著名世界遗产清水寺举办“今年的汉字”发布活动。主办方是总部设在京都的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这个机构每年都要向民众征集问卷,答卷者选择一个适当的汉字来表现当年的社会态势。这项活动目前已成为年末的一个社会关注景点。2011年对于日本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国民在战胜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以及台风造成的各种严重灾害过程中,深深感悟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11年底,根据市民投票的结果,最终选用了汉字“絆”作为这一年的象征性文字^①。胡宝华教授的力作《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关于上个世纪初期以来日本出版发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史学著作解题书目,这部著作恰好具有像“絆”字一样的纽带功能,是一项将中日两国学术界联系到一起的学术成果。

自从1960年春,我在京都大学提交毕业论文《关于唐宋变革与使职》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在研究隋唐时代的中国历史。借这个机会,我想陈述一下尊敬的隋唐史研究前辈唐长孺先生和张广达、张泽咸两位先生对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所给予的评价。

① 日语“絆”的含义有几种,这里表现的是“纽带、联接”之意。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日本和中国尚未邦交,1972 年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数年,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日中间的学术交流终于提到了正常的议事日程。1980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置了外国人客员教授的新职位,最初受到邀请的是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关于这次邀请的原委,在拙文《唐长孺先生在京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21 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专辑,2004 年)中有详细叙述。唐先生在洛中(京都),每天都要阅览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于重要的论文,出于个人以及学生的需要,全部复印带回了国内。唐先生对日本学界所给予的深切关注,在诞辰百年上梓的《唐长孺文集》8 册(中华书局,2011 年)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到。

唐长孺先生访日后的第二十五年,接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样待遇邀请的是来自巴黎的张广达先生。张先生这次访日回国后,邮寄送给我一套他的文集(《张广达文集》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在第一册《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的“自述”中,收录了《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原载于《学林春秋三编》上(朝华出版社,1999 年)的自传文章。文中,张先生回顾了自己 1978 年 47 岁开始在北京大学正式走上讲台,讲授中国通史和隋唐至两宋历史的经历。他说:

就是这样,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终于选择了隋唐、中亚为研究对象。受陈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说的启示,我将隋唐与中亚史结合在一起;受内藤虎次郎的中国近代始自唐宋之际说和堀敏一的中国各地可能分头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五代十国时期说的影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晚唐五代。

在该书的“学术史”部分,在与王国维有关的两篇文章后,收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这是原载于《唐研究》第 11 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卷首、张先生的一篇大作。

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10 卷,199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译丛挑选了 20 世纪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水平的部分论文,出版后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欢迎。除了第一卷《通论》收录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以外,其他全部属于学术论文。针对第四卷收录有 13 人 19 篇论文的《六朝隋唐》,张泽咸先生很快就在《书品》1993 年第一期发表了书评(此文收载于氏著《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 年)。张先生在文章中首先详细介绍了宫川尚志《六朝时的村》、滨口重国《关于隋代乡官之废止》、砺波护《唐代县尉》三篇。张先生对这三篇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上述有关村、乡官、县尉三文,都是涉及州县以下行政制度及官制的重要课题。日本学者选题精细,论证深入,是这一学术领

域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读十九篇论文，我深感诸位学者的行文各有特色，他们或治学态度谨严，措词一字不苟；或高度自律，勇于修正自己的失误。”对照上述三位先生的评价，我可以自信的说，在隋唐史学的领域，日本的学术研究确实作出了非常可观的贡献。实际上，其他时代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20 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是一部编年体的解题书目。同样采用编年体例，南开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杨翼骥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先秦至五代，1987 年），这是我非常爱用的一部著作。

本书著者胡宝华教授是已故唐史专家胡如雷先生的次子，1954 年生于上海。“文革”期间的 1969 年北京中学毕业后去内蒙古包头的兵团工厂做工，经过 10 年的磨练，“文革”结束后走进了大学。1985 年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硕士毕业，1988 年 12 月赴日留学京都大学，在日本潜心于唐史研究的 12 年中，1996 年提交了博士论文《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并通过了由我担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查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2000 年 9 月回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在由我作序、胡宝华著《百年の面影——中国知識人の生きた二十世紀》（日本角川选书，2001 年）一书中，最后的两章记述了他前半生的经历。

最后还想提到的一点是，《20 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没有收录工具书方面的成果，因此，这里想介绍一部 2006 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主编《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希望它能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与参考。

2011 年 师走（腊月）

前 言

一 缘起

日本中国史学界的 20 世纪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纪,日本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内藤史学(也称‘内藤假说’)”、“白鸟史学”、“津田史观”、“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地域社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给日本史学界注入了太多的刺激与活力,几代蜚声海内外史坛的学术名流脱颖而出。著名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就是在围绕其中一些理论观念与研究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学者在激烈认真的学术争论中,先后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颇深的学术著作,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推到了 20 世纪的巅峰时期。

今天,虽然 20 世纪已经从历史纪年上走过,但是上世纪的学术生命并没有因此完结,一些著名的命题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新世纪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①可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过去一百年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承上启下是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初萌发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史学著作整理介绍给国内学人的想法,是我在 20 世纪末留学归国后,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讲授“20 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课程中逐渐形成的。当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国内史学界对日本中国史研究成果缺乏整体的了解。199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著作选译》10 卷,为我们了解 20 世纪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打开了一

^①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于《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个重要的窗口。近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海外汉学的系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日本名著译丛的计划,这些举措无疑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是,这些翻译的著作毕竟只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几部学术代表作,它仍然难以让中国学者通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全貌。特别是每年研究生在选题和撰写学位论文时,对于许多作为研究史上应该参考和了解的国外重要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也常听到一些评委在不甚了解国外研究动态的前提下即对某课题给予“补白之功”的赞许。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而且也很难与国际学术接轨。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一直在想从目录学的角度,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主要代表著作的要目编辑成书,介绍给国内的同行。2008 年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先生的大力关注下,我获得了一年访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宝贵机会,这部工具书的编纂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以下,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上个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及其学术传承,笔者试对日本各主要大学与中国史学相关的课程设置、教授阵容做一粗略的陈述。

二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发展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大学东洋史学的设置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日本的东洋史学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日本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建立于明治十年(1877)的东京大学,1886 改称帝国大学。明治时期日本的世界史教育始终是以西洋史为中心展开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首先提倡在中等教育课程中分别开设西洋史和东洋史。同年日本的中学开始设置了中国历史,其中包括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史方面的内容。那珂通世在日本享有盛名的传世之作《中国通史》就是为中学历史课程而编写的。1897 年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设置了“中国历史”的选修科目,由那珂通世讲师和林泰辅副教授担任。但是林泰辅的讲义内容受到了当时以藤田丰八为首的学生批判与排斥。藤田等人认为林泰辅的学问陈旧,他们要求的任课教师不是讲汉学而是要通晓东洋史学。^① 当年,林泰辅辞职后,市村瓚次郎继任副教授。1904 年,东京帝大文学部

^① 岸本美绪编《“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东洋学的磁场》;第一章:日本的“东洋学”形成与构图(中见立夫撰);第 29 页。岩波书店 2006 年。

设置了中国史学科,市村瓚次郎和白鸟库吉担任教授。1909年前后中国史学科改名为东洋史学科,并开始实行二讲座制度。市村主讲中国各断代史,白鸟主讲蒙古史和西域史。在他们执教东京帝大的二十余年间,不仅为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藤田丰八、中山久四郎、箭内互、池内宏、加藤繁、原田淑人、和田清、桑原隲藏、羽田亨、桥本增吉、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等。此后,这批学者为日本各大学的东洋史教育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史、中亚史、边疆史、民族史及中西交通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东京帝国大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日本政界也成为东京帝大毕业生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届总理及其各重要部门的官僚绝大多数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拜官主义在东京帝大广为流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当时的帝国议会议长谷川泰等32位议员提案,建议在关西地区再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他们认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创立以来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出现了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帝国大学的形象。为了激发学问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必要在西京(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形成一个能够与东京帝大匹敌的竞争对手。^①同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方教育家大会上,时任帝国博物馆馆长的九鬼隆一(京都帝国大学条例起草者)指出:建立在京都的大学不仅不能逊色于欧洲诸大学,还应该担负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成为东洋学的主盟者。^②这个发言,实际上为未来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的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在长谷川泰等人提案的五年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应运而生。

京都帝大建立后,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这所大学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针对东京帝大的文科设置,1906年京都帝大设置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学”,它包括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三个学科。特别在“东洋史学”领域设置了三讲座制,从数量上看,比东京帝大增设了一个讲座,它表现出京都帝大从一开始就对东洋史学的发展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最初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由内藤湖南主持,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第二讲座桑原隲藏主持,讲授东西交涉史等;第三讲座矢野仁一和羽田亨共同承担,讲授朝鲜史、塞外史以及中西交涉史。在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等教授开创的学术环境熏陶下,京都大学如同东京大学一样,先后培养出几

① 潮本守一《京都帝国大学の挑戦》,第10—12页;讲谈社1997年。

② 参照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前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代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有宫琦市定、安部健夫、那波利贞、田村实造、爱宕松男、曾我部静雄、藤枝晃、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佐伯富、川胜义雄、谷川道雄、河内良弘、竺沙雅章、永田英正、吉川忠夫、梅原郁、砺波护、爱宕元、夫马进、杉山正明、富谷至、岩井茂树、吉本道雅等。他们共同构建了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繁荣与辉煌。

20世纪初,日本政府除去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之外,还陆续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建立了北海道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发展随着七所帝国大学的设置逐渐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侧重不一的学术重镇。

东北帝国大学建立于1907年,东洋史学是1924年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冈崎文夫(京都帝大毕业)担任当时法文学部史学第二讲座时开始的。1931年唐宋财政史、法制史专家曾我部静雄(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东洋史学第四讲座教授;此前,冈崎文夫与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青木正儿(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讲授中国哲学的武内义雄(京都帝大毕业、日本学士院院士)一起建立了“东北中国学会”,为东北大学的中国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9年,日本契丹史研究重量级的专家爱宕松男(京都帝大毕业)就任东北大学。爱宕松男的博士论文《契丹古代史研究》曾被京都大学田村实造教授称之为“在契丹史研究上建筑了一座金字塔”。50年代以后,先后执教东北大学的还有佐藤圭四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寺田隆信、安田二郎、熊本崇等教授。

九州帝国大学建立于191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开设于1927年,首任教授是重松俊章。重松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大,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和中国古代民俗学。1935年九州帝大东洋史迎来了又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日野开三郎,日野研究重点在于唐宋社会经济史方面,1980年《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20卷的出版,记录了日野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后在九大东洋史讲座先后执教的还有铃木俊(东京帝大毕业)、中村治兵卫(东京帝大毕业)、江岛寿雄、越智重明、船木胜马、川本芳昭、中岛乐章、船田善等教授。

北海道帝国大学建立于1918年,1947年设置法文学部后,开始有了东洋史学课程。首任教授是板野长八(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次是藤井宏(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当时还有讲授北亚史的护雅夫(东京帝大毕业)。1949年,从事明代史研究的佐久间重男(东京帝大毕业),赴任北海道大学教养学部。1950年,随着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的独立,东洋史学讲座正式形成。1962年文学部史学科经历了再次整合,东洋史采用二讲座制。第一讲座中国史;第二讲座塞外史。5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执教的有本田实信、池

田温、武田幸男、菊池英夫、滨岛敦俊、中井英基、菊池俊彦、津田芳郎、川合安、三木聪等教授。

大阪帝国大学建立于1931年,东洋史学讲座的设置是在战败取消帝制后的1949年5月,首任教授桑田六郎(东京帝大毕业),此前他是旧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研究领域为东西交涉史和东南亚史。50年代期间在大阪大学执教的还有守屋美都雄(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山田信夫(东京帝大毕业),研究领域为北亚史和中亚史;60年代以来,先后在大阪大学讲授东洋史学的还有杉本宪司、潮田富贵藏、布目潮风、间野英二、斯波义信、中村哲夫、本田治、谷口规矩雄、森安孝夫、滨岛敦俊、片山刚、桃木至朗、荒川正晴等教授。

名古屋帝国大学建立于1939年,是日本建立的最后一所帝国大学。1948年该大学设置文学部以后,宇都宫清吉(京都帝大毕业)为东洋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其后波多野善大(京都帝大毕业)、谷川道雄、森正夫、重松伸司等相继执教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形成了日本史学界的又一重镇。现在名古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有江村治树、井上进;东南亚史教授有加藤久美子、林谦一郎等。

此外,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设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这就是著名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29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机构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1938年4月东方文化学院改组,京都研究所独立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以后经过发展整合形成了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研究所则成为(新)东方文化学院,后合并到1941年建立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不仅拥有一流的研究设备与文献资料,还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人才。例如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仁井田陞、江上波夫、关野雄、山本达郎、周藤吉之、米泽嘉圃、镰田茂雄、西嶋定生、蜂屋邦夫、铃木敬、斯波义信、池田温、松丸道雄、田仲一成、滨下武志、羽田正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代成员中有安部健夫、贝塚茂树、塚本善隆、森鹿三、藪内清、福永光司、藤枝晃、竹内实、山田庆儿、吉田光邦、梅原郁、砺波护、吉川忠夫、狭间直树、森时彦、岩井茂树、高田时雄、富谷至、金文京、曾布川宽、田中淡等。

这两个研究机构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们设置的各类共同研究班,更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与借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自1949年以来,截止到2000年,先后设置过100余个共同研究班。如藪内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班(1949—1957);岩村忍的“元典章”研究班(1950—1969);森鹿三的“居延汉简的研究”班(1951—